

自我来黄州已遇三寒
食年一欲惜春主不
寒惜今年又苦雨高月社
箫瑟所闻海棠花泥
污燕支雪閣中偷負
多夜半真有力何殊少
年家病起須臾日
春江欲入广雨势未
不之雨小屋如溪舟濠
水雪寒空庭寒寒寒
破竈燒酒華那
知是寒自但見鳥
銜帛天門深
九重空差在万里遙
哭淫窮邪屋吹不
起

右黄州寒食二首

宋代史论研究

孙立尧 著

中华书局

K244. 07
S938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宋代史论研究

孙立尧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史论研究 / 孙立尧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4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6620 - 3

I. 宋… II. 孙… III. 中国—古代史—研
究—宋代 IV. K24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1057 号

-
- | | |
|-------|---|
| 书 名 | 宋代史论研究 |
| 著 者 | 孙立尧 |
| 丛 书 名 |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
| 责任编辑 | 罗华彤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
| |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
| | http://www.zhbc.com.cn |
| |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
| 版 次 |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
| |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
| | 印张 21½ 插页 2 字数 340 千字 |
| 印 数 | 1-2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6620 - 3 |
| 定 价 | 54.00 元 |
-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总 序

程章灿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古典文献对中国文化传承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以一种相对集中而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且通过传抄、印刷、编辑、整理、诵读、研究等传播方式,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参预了对中国人的心理情感和思想文化内涵的塑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在文献传承的过程中,不仅各个学科领域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文献的传承,参预了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特色的塑造,并影响了中国人对自身心理情感与思想文化的民族认同;而且,作为文献著录和书籍传承的重要支撑的目录学,也一贯致力于整合林林总总的固有文献与已有知识,使之系统化与合理化,与此同时,其自身还构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框架。有鉴于此,几年前,当南京大学文学院(当时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正式实施国家“985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研究计划时,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古典文献研究所的同人们集思广益,提出以“文献传承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为名设立子课题,并很快通过了专家组的立项论证。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就是这一子课题的研究成果。

显然,在设计这个子课题时,我们主要着眼于其理论框架的建构与宏观思路的拓展,力图从大处着眼,以开拓我们的思维。但是,在这项研究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到,只有针对具体的对象和确定的问题展开学术研究,运用多年的学术积累,发挥自身的学术优势,才能真正推动这一领域的学术进展,不管这些进展是理论方法的创新,还是文献史料的丰富,或是对具体问题研讨的深入。因此,我们决定从专题研究入手,对各项历史文献展开整理、解读和阐释,不避小题,以避免不切实际的蹈空议论。也可以说,我们的宗旨就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我们相信,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文献进行的整理与研究,可以构筑坚实的工作基

础,搭建良好的阐释平台,进而深入探究中华民族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方面基于心理情感以及思想文化基础之上的民族文化认同;同时,研究作为文献传承的知识支撑系统的目录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也有助于追踪中国文献、知识以及学术思想框架形成的过程及其特殊性。另一方面,我们既注重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的传世文献、儒家正统文献以及域内文献的传承研究,又重视对出土文献、非儒家文献以及域外文献的传承研究。关注这些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文献,当然意味着文献视野的进一步开阔,但更重要的是,从新的文献视野中,也有可能发展出观察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新眼光。

具体说来,这套丛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目录学及其历史发展为核心,探讨富有中国特色的文献、知识以及学术文化框架渐次形成的过程及其特质,最终叩问中华民族文化之特质。清代史家章学诚在其名著《校雠通义·自叙》中早就说过,“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近代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中更明确指出:“目录者,学术之史也。”徐有富长期致力于目录学研究,其《目录学与学术史》一书,择取《汉书·艺文志》、《七录》、《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元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等目录学名著,从文献聚散、类别分离、序跋评说等方面入手,辨析古代学术各门类的兴衰分合,从中规见中国学术思想的起伏变迁与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体系中,经学无疑占有首要地位,相关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经学目录在目录学中也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长达三百卷的朱彝尊《经义考》是清初最重要的经学目录著作。它从目录学角度,对清初以前的经学著述之目及其分类、存亡、阙佚等情况详加考述,“源委详明,足称博赡”,可称是一部集大成的经学目录。另一方面,作为朱彝尊“穷一生之力”完成的私家著作,《经义考》所建立的经学目录的新体系,在经学学术史上亦自具承先启后的意义。张宗友《〈经义考〉研究》一书,从文献著录与学术承传的角度对这一部专书条分缕析,论列甚详。

第二,以书院研究为中心,探讨书院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对文化遗产的作用。正如《书院与文化遗产》一书编者所强调的,“对书院史研究的重视,并不是在单纯保存文化记忆,而是在教育体制发展的背景下,在传统中寻找可供转化的精神资源”。这是众多书院研究者共同的人文关怀,也是编选这本论文集的特别动机之一。从官学与私学的关系来

说,书院显然属于私学。在一定意义上,研究书院与研究私家书目颇为类似。研究私家书目,就是探讨中国传统目录学形成过程中有别并且独立于正统官修目录之外的另一个目录传统;研究私家书目与官修目录如何互动,就是探讨民间学术如何与官方学术相互影响,以及不同知识学术体系如何融合组成传统知识文化体系,并影响后代中国人的知识文化系统的构建等问题。在这套丛书中,《书院与文化遗产》有些与众不同。作为一部论文集,它既荟萃了包括胡适、聂崇岐、邓之诚、瞿宜颖等前辈学者在内的重要论文,又选录了近年学者的研究心得;而它的编者卞孝萱和徐雁平也同样属于两代学者——它从两个方面象征了学术文化的薪火传承。

第三,从那些通常不太为人重视的文献入手,挖掘一些曾经受到忽略甚至被长期埋没的学术问题,探究这些文献中新的学术文化蕴涵。石刻文献、笔记小说文献、域外汉籍文献,都是以往研究中不大为人重视的。虽然从宋代以来,金石学便已成为一种专门之学,但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世风和学风的转变,关注石刻文献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对那些传世石刻文献,很多人似乎把它们遗忘了。实际上,不仅二十世纪新出土的石刻值得研究者注意,传世石刻中也仍然有许多意义空间有待开掘,有许多学术问题有待探索。《古刻新诠》是作者近十多年来所撰石学研究论文的结集。书名中所谓“古刻”,既包括传世石刻,也包括新出土的石刻。书名中标明“新诠”,意在强调这两类石刻都有重新诠释的必要和前景,这也正是文化遗产的题中应有之义。书中考释涉及文学、语言、史学、艺术等领域,说明这种诠释正不必划地自限。严杰《唐五代笔记考论》实际上也可以改题“古稗新探”。作者潜心研治唐五代笔记小说二十余年,对笔记小说的概念、范围、唐五代笔记传承情况及其文化价值都有独到见解,对与此相关的正史与笔记、事实与虚构、当世记录与后代修饰等重要问题亦有深切理解。本书分上、中、下三编,包括总论、述要与具体考述三个部分,面、线、点相结合,考论相兼,无论是全局描述,还是微观考证,对于唐五代小说、历史及文化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要深入理解文献的意义,不仅需要了解文献自身的形成及其传承过程,也需要参考和借鉴前人的研究积累。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小说研究基本上不登大雅之堂,二十世纪以降,小说研究才“升格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专学,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区别于传统学术的特色与个性之所在”。这一份丰厚的学术遗产应该及时清理,其中的利弊得失亦有待总结。苗怀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研究分为四个时期:二十世纪上半期、建国后三十年、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从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等方面,对这一学术领域的成果作了全面盘点,尤其突出有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名著的文献。小说的产生、存在、传播的社会文化语境与诗文辞赋等文学样式有很大差异,小说研究也相应地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苗著从学术史角度所作的文献清理,显然有助于这两方面的正本清源。

对域外汉籍文献的重视,是本丛书的一个特色。《古刻新诠》中有长文考释《大越国李家第四帝崇善延龄塔碑》。巩本栋《宋集传播考论》也十分重视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学史料,并以相当可观的篇幅论述宋集撰述流传高丽、朝鲜两朝的情况。金程宇《稀见唐宋文献丛考》更是致力于发掘日本、韩国所藏唐宋文献,并利用域外访获的资料对中国固有文献进行订补,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有《帝王略论》、《李元宾文集》、《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等多种。另一方面,作者还从出土文物以及法帖、墨迹等传世文物中,发掘并整理出一批珍贵的唐宋文献。如果说文物是以另一种物质形态出现的文献,那么,域外汉籍则是在另一种文化环境生存的文献。如果说文物指向的是物质文化与典籍文化的复杂联系,那么,汉籍在域外的承传,则往往是中国文化与周边国家文化密切关系的见证。

第四,对宋代文献的研究是本丛书的重点之一。这不是偶然的。在中国文献传承史上,宋代是由抄本时代真正进入刻本时代的转折点。无疑,刻本时代的到来对文献传承和文化繁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宋集的刊刻和流传,无论就其外部条件还是就其质量及数量而言,都远胜前代。《宋集传播考论》从宋集的编辑、刊刻、流传以及明清人对宋集的整理等方面,对宋集的传播作了全面论述。宋代文学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集是宋代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宋集的传播也就是宋文化的传播。在宋集之中,诗选颇为引人注目。宋人尤其是南宋人好讲学,好议论,也好选诗、评诗,加上刚迎来刻本时代,南宋诗歌选本盛极一时。甄选前代或当代的诗歌,甚或加以评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介入文献传承的行为,而其成果便转化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文献。这些文献承载了当时人的诗学观念,承载了后人对前代诗歌文化的理解,记录了后人对再后人的影响痕迹,尽管其后来或存、或残、或佚,但通过对这些文献遗存的清理,我们观察南宋诗学之时,就可以占据一个更好的文献传承的视点。卞东波《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中重点考论的八种南宋诗选以及其他二十多种诗选,在这一方面的意义不容小觑。与前两种著作不同,孙立尧《宋代史论研究》则以史论文献的整理与阐述

为中心。“宋代是中国史学的颠峰,而史论正好契合了宋代的文学、史学、经学与理学等诸多学术问题。”史论据史事而发,集中体现当时人对历史的理解与利用;又依经立论,深受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作为一种论说文,其文章又呈现出文学化的诸多趋向。夸大一点说,宋代史论是一种跨越经、史、子、集四部的文体,遗憾的是,以往学者对此类文献关注甚少。孙著不仅有对两宋史论发展的线性描述,对史论的文学化与理学化也有颇为深入的剖析,很值得一读。

这套丛书的作者和编者,目前都供职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多年以来,他们精诚合作,凝聚成了一个团结奋进的集体。这个集体的成员们坚持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学风,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本丛书就是部分团队成员的集体展示。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作者队伍中,既有寿逾耄耋而老当益壮的卞孝萱先生,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人,还有年方而立的后起之秀。当然,读者们也不难看出,丛书中有少量成果是在课题开始之前完成的,这说明我们一贯的研究方向与这一课题旨趣不谋而合。整理典籍,阐释国故,发古典之新义,阐旧邦之新命,这是文献传承的核心内涵,也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也许我们做得不够好,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目 录

第一章 史论通解	1
第一节 历史研究之目的	1
第二节 史论与史学	12
第三节 史论之形式	22
第四节 先宋史论述略	27
第五节 宋代史论的学理分析	49
第二章 北宋史论	65
第一节 北宋初期的史论转型	65
第二节 孙甫	71
第三节 司马光与范祖禹	81
第四节 欧阳修	108
第三章 史论的文学化	126
第一节 苏轼与史论的文学化	126
第二节 苏门史论及其影响	136
第四章 南宋史论	148
第一节 北宋史论之余绪	148
第二节 李纲与李焘	162
第三节 胡寅与《致堂读史管见》	180
第四节 陈亮与叶适	202

2 宋代史论研究

第五章 史论的理学化	233
第一节 初期理学家的史论	233
第二节 朱熹	246
第三节 张栻	253
第四节 吕祖谦	263
第五节 钱时	275
附论：经筵进读、进故事	290
参考书目	325
后 记	334

第一章 史论通解

第一节 历史研究之目的

历史是时间的学问,而藏在人类的记忆之中。一般而言,历史有两种内涵:一是指曾经发生过的事件,这在承认时间存在的前题下是客观的,其事一旦逝去,不可复得;另一种是指史料中所记录的事件,它是人类记忆的展现,也是相对的。历史研究的对象终究只能是后者,而对待史料的不同态度,也必将产生不同的历史哲学。

英国历史学家沃尔什将历史哲学分为两种,一种是“实验的”,另一种是“唯心的”。前者的最终目标在于使历史学同化或认同于自然科学,从而探寻其客观规律,是历史学的形而上学;而后者则是历史学的认识论,研究“历史认识”本身的性质,追问历史研究中所预设的前题和价值判断。沃尔什分别称之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显而易见,这两种观念的产生是出于其史学支点的不同。^①

通常认为,中西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史学只有大量的历史记载,而缺少历史解释的意识,西方史学则正好相反。杜维运说:

以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相比较,中国史学以叙事为大宗,西方史学则以解释为首要。中国史学中之编年、纪传、纪事本末诸体,皆为适合于叙事之史学体例,中国史家亦斤斤焉墨守成规,直述往事,不著己见。西方史学则有一极适合于史学解释之史学体例,其体为选题详述,溯其渊源,明其发展,而穷其究极,类似中国之纪事本末体而实异其趣。西方史家亦能编织史实,运用史实,以从事于历史解释。

^①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页6—8,“批判的和思辨的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因之读中国之史学作品,所得者为无限之史实;读西方之史学作品,所得者为种种清晰之概念。^①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历史哲学”这一概念并不存在,但并不意味着传统史家在分析和研究历史时缺乏最基本的历史思维。事实上,中国传统史家的历史思维较为恒定:首先,其史观大体以儒学为基础,司马光所谓“史者,儒之一端”^②,即其明证;^③其次,中国史家必须保持一种“信史”的观念,既确信历史的真实性,也认为史事之中蕴藏着永恒的规律,即所谓“道”。因此,中国传统史学如果存在一种历史哲学的话,它既是“实验的”,也是“唯心的”,前题即结论,二者本不可分。^④故直述往事之时,虽似“不著己见”,而其“见”已深透其中。

儒学的基本典籍在于“六经”,因此中国传统史学常为经学的附庸,本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古代学者不断地强调史学必须以经学为根本。苏洵《史论上》:

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使后人不知史而观经,则所褒莫见其善状,所贬弗闻其恶实。故吾曰: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使后人不通经而专史,则称谓不知所法,惩劝不知所

①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页15:《王夫之与中国史学》,中华书局,1988年4月第1版。

②《资治通鉴》页3868,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

③汪荣祖认为西方史家称中国传统史学为“儒家史学”是一种误解,参见其《史学九章·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3月北京第1版。案:汪氏实以西方史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史学,故不得不为之辩护。实则儒家观念来褒贬人物,无损于我国传统史学的光辉。

④事实上,不仅儒家的史学为然,传统史学都有此意味,史家的陈述,有赖于一些前题假设或条件。沃尔什称:“一个事实并不是不管有没有人注意到它,它都是存在着的某种东西;它毋宁是一种思维过程的结论。事实并不像符合论所想像的那样,是可以被简单地被人领会的;它们必须是被人确立。而这就意味着,事实和理论之间确实并没有原则区别。一个事实只不过是它自身已经确立了的理论,是对它那可靠性已经不再有任何认真的怀疑的一种理论。”见《历史哲学——导论》页7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祖。吾故曰：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①

此犹是经史合一之论，“经”即儒家的经典，“史”的意义与“经”同揆，“史”可以作为“经”中道理的确切证据，而“经”也足以给“史”以指导意义。至于读书为学之次第也极其分明，必先穷研经籍，然后方博览史书，经学为本而史学为用，朱熹述之颇详：

若是读书未多，义理未有融会处，而汲汲焉以看史书为先务，是犹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②

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人未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③

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④

这也是后世儒家的一个共识，乃至成为格言，所谓“先读经，后读史，则论事不谬于圣贤；既读史，复读经，则观书不徒为章句”^⑤。

这种观念由来已久，而与“史”的意义共存。中国的史官建置甚早，《汉书·艺文志》所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⑥。而以史为鉴的观念自有载籍开始便已产生，《诗》、《书》之中屡见不鲜。《书·盘庚》谓：“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商人每举“古我先王”之言与德；周人承之，常称“殷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诗·大雅·文王》）、“殷鉴不远，在夏后之氏”（《诗·大雅·荡》）；《尚书》之中，周人也屡引殷商之事为诫。

三代以来，“史”的意义便在于给后世提供借鉴，此观念初非儒家所特有，但儒家最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将其纳入儒学传统之中。古代史家具有极强的责任感与目的性，自《春秋》已然。《孟子·滕文公》中记载：

①《嘉祐集笺注》页2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②③《朱子语类》页195，中华书局，1994年3月第1版。

④《朱子语类》页2950，中华书局，1994年3月第1版。

⑤《格言联璧》页17，岳麓书社，2003年10月第1版。

⑥《汉书》页1715，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①

孔子之作《春秋》，本欲拯救世道人心，其义光远，故能使“乱臣贼子惧”。《左传·成公十四年》更直接地指明了其价值：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②

《春秋》之目的在于“惩恶而劝善”，这也成为史学的根本传统。史家莫不奉以为圭臬，故《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董仲舒之言曰：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而恶恶，贤贤而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③

历代论史者亦皆承之，从刘勰“彰善癉恶，树之风声”（《文心雕龙·史传》），刘知几所谓“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癉恶”（《史通·曲笔》），到章学诚“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文史通义·史德》），莫不如是。而这一传统在宋代史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司马光编辑《资治通鉴》，即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

①杨伯峻《孟子译注》页155，中华书局，1960年1月第1版。

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页870，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2版。案：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以“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为《春秋》之“五体”，并说：“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见《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页1707，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9月第1版。又钱锺书以为：“五者乃古人作史时心向神往之楷模，殚精竭力，以求或合者也。”是史家的最高标准；又说：“就史书之撰作而言，‘五例’之一、二、三、四示载笔之体，而其五示载笔之用。”其用昭彰，以示劝诫，不辩而自明。《管锥编》册1，页161—162，中华书局，1986年6月第2版。

③《史记》页3297，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年一书”^①，范祖禹作《唐鉴》，也称“今所宜鉴，莫近于唐”^②，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以更好地治平天下，深契中国古代儒者的政治理想。

就此历史研究之目的与意义而论，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古典史学颇为一致，虽其侧重点或有不同。古罗马史家塔西陀在其《编年史》中提到：“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把后世的责难，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③其褒贬意义显然。而美国新史学的开山鲁宾孙在谈西方传统史学时也说：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人们可以从过去的事情中汲取教训，如政治家 and 军事家的先例，道德的指导以及使一般人得到安慰的那种天道的干预。^④

其旨趣与中国传统史家如出一辙。通过察古而知今，以求得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种规律可以悬为万世龟鉴；它不仅可以指导现在，也可以预示将来。自变化中求取永恒，这正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要义所在。

所谓历史规律，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本质上就是史家所预设的儒学体系。儒学虽非一成不变，但并无颠覆性的变化，故传统史学观念的变化也是如此。可以说，史学观念的发展，也即是儒学观念的发展。

当代史家虽然不必以儒学来定义历史，但传统却无可割断，传统史学的儒学精神也未因此逸失，它深根密植在我们的心灵里，故历史之镜足以映照自身。钱穆认为：

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不仅要认识我们的以往，并

①司马光《进书表》，见《资治通鉴》页9607，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

②《唐鉴序》，《唐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4年10月第1版。

③转引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页62—6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④鲁宾孙《新史学》页15，商务印书馆，1964年6月第1版。

要认识我们的将来。^①

在历史中认识自己,此语殊堪玩味。此说仍是传统史学“以史为鉴”的延续,这里的“自己”并不指某一个体,而是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

现代史家显然并不认同所谓“历史规律”。“思辨的历史哲学”虽是传统史学观念的核心,但这一名词在今天已经具有某种贬义。

首先,自19世纪以来的西方实证史学认为,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乃是强加于历史之上的价值判断,有损于历史的公正与客观,也妨碍理解历史的真相。历史不应该有价值判断,只须陈述事实就够了^②,用兰克的名言来说即“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正像它本来的面貌那样)。

从根本上说,历史的客观是一种幻想,史实的不精确性是中外史家共同的疑问,虽然有人将其归结为一种“合理的历史想像”,但是此外仍有各种因素造成史实的失真。^③况且最重要之处在于,每个史家都有他写史的前题观念,史家作史取材之际,即已有判断,毫无纯粹客观可言。而其所取的材料亦已经过前人判断,渗入前人的理念了,不啻是一种双重的主观。朱熹论司马光作《通鉴》取舍之事说:

①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页1—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北京第1版。

②汪荣祖《史传说一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彰善瘅恶第三》,中华书局,2003年12月新1版。又其《史学九章》页181—18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3月北京第1版。

③孟子早就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又方孝孺《晋论》中曾说:“书不可尽信也,而纪载之词为尤甚。同时而仕,同堂而语,十人书之,则其事各异。盖闻有详略,辞有工拙,而意之所向,好恶不同。以好恶之私,持不审之论,而其词义不足以发之,能不失其真者鲜矣。况于世之相远,或数百年,耳不闻其言,目不睹其事,身不预当时之得失,意揣心构,以补其所不足,而增其所未备,或有所畏而不敢直书,或有旧恩故怨而过为毁誉,或务奇眩博而信传闻之辞,或欲骇人之视听而驾为浮辨,自左氏、司马迁、班固不能免乎此弊,况世之庸史,其能传信而不诬哉?”见《逊志斋集》卷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郭嵩焘谓:“夫史之失诬,其原有四:或蔽于耳目之闻见,或牵于流俗之毁誉,或以一人之爱憎,而一二欲之流传,又加以附会,或以一事之得失,而其人生平之大端反为之曲饰。”《郭嵩焘日记》,册1,页508,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而沃尔什也将史学家之间意见的不同归纳为四点,即:“个人的偏好、集体的偏见、各种互相冲突的有关历史解说的理论、根本的哲学冲突。”见《历史哲学——导论》页101—11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通鉴》：“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议更法，首便有斩敌首、降敌两条赏罚，后面方有此两句比类之法。其实秦人上战功，故以此二条为更法之首。温公却节去之，只存后两句比类之法，遂使读之者不见来历。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此类多矣。^①

温公《通鉴》不信“四皓”辅太子事，谓只是叔孙通谏得行。意谓子房如此，则是胁其父。……又不信剧孟事，意谓剧孟何以为轻重！然又载周丘，其人极无行，自请于吴，云去呼召得数万人助吴。如子房、剧孟，皆温公好恶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论以明之可也，岂可以有无其事为褒贬？^②

然则史家的取舍标准即其价值判断，史料的轻重源于这种价值判断。况且欲述史事的前因后果也不能不作判断，客观总是相对的。因而，一个严谨的史家，谨慎地作判断，以成“一家之言”，本来也无可非议，欲求历史中绝对的客观事实反而变得毫无意义。

其次，现代史家认为，从历史中寻求一种永恒的规律也是一种幻觉，其本质是与历史相悖的，柯林武德在评判希罗多德时，就指出希腊思想的“反历史倾向”：

历史学家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人类在过去所做过的事，而这些都属于一个变化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事物不断地出现和消逝。这类事情，按照通行的希腊的形而上学观点，应该是不能认识的，所以历史学就应该是是不可能的。^③

希腊人追求永恒不变的真知(ἐπιστήμη)；而非意见(δόξα)，即“经验性的半——知识”，一种不断流变的认识。意见是不能被证明的，变化的历史中本不可追求永恒的东西。他称希腊人的这种思想为“实质主义”：

凡属于不变的东西都不是历史的，成其为历史的东西都是瞬息

①《朱子语类》页3205，中华书局，1994年3月第1版。

②《朱子语类》页3206，中华书局，1994年3月第1版。

③《历史的观念》页51，商务印书馆，1997年9月第1版。